

※ 文哲所三十週年所慶專輯 ※

比較哲學研究回顧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於一九八九年成立籌備處時，最早規劃的五大方向之一是比較哲學。這項決定很有智慧。因為現代的中國哲學研究無法避免與西方哲學的對比，換言之，它必然或隱或顯地包含一個比較哲學的面向。本所規劃比較哲學的研究方向，目的就在使中國哲學研究向西方哲學開放。

本所於一九九〇年開始進用研究人員。我是在次年進入本所。本所籌備之初，因人員不多，百廢待舉，無法從事集體研究計畫。一九九二年，第一任籌備處主任吳宏一先生因病辭職，由戴璉璋先生接任。戴先生上任之後，有意推動大型研究計畫。他邀請當時尚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擔任系主任、同時為本所設所諮詢委員的劉述先先生來臺規劃。當時我便建議「當代儒學主題計畫」，戴、劉二人都大表贊成。後來臺大歷史系的黃俊傑教授也加入我們的陣營。為此我們成立了「當代儒學研究室」，這是本所設立的第一個研究室。該計畫初步以三年為期，以「當代儒家對時代問題的回應」為主題，由戴、劉二人共同主持，執行期間自一九九三年八月至一九九六年七月。

此項研究計畫之提出有其直接與間接的背景。就間接背景而言，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臺灣的儒學研究一向偏重於傳統儒學；在現代儒學的研究方面，除了個別學者的研究之外，從來沒有一個學術機構推動過集體研究工作，甚至在大學中也很少開設過這方面的專題課程。在這種背景之下，「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之提出實有其必要性。

至於直接的背景，則是中國大陸的學術轉向。大陸學術界在歷經長期的反傳統

*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運動之後，從一九八〇年代逐漸轉向，開始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共當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會中通過將「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列為「七五」期間國家重點研究課題之一，並且通過以天津南開大學哲學系的方克立教授和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的李錦全教授為課題負責人，總共網羅了十六個單位的四十七位學者。大陸的課題集中大量的人力，以大軍團作戰的方式，選定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方東美、馬一浮、劉述先、杜維明和余英時等十四人為重點研究對象，藉由出版資料選編、學案、專著、論文集等方式，對當代儒學進行全面的探討。由於大陸學術界的人力充沛，一經動員，很容易形成局部優勢。這對臺灣的學術界自然是很大的挑戰，因為這涉及對傳統儒學與現代儒學的解釋權。

我們的研究人力自然比不上大陸，但是我們有一項優勢：大陸的新儒學研究起步較晚，研究工作必須從資料的編纂、資訊的蒐集與觀點的吸收做起；反觀在臺灣，由於當代儒學的學脈從未中斷，研究者可以越過大陸學者所從事的基礎工作，直接進行較為細緻的理論探討與批判反省。打個比喻來說，大陸的研究課題有如大規模的粗放農業，我們的研究計畫則有如小面積的精緻農業，彼此的定位不同，發展階段也不同。為了突顯此項研究計畫的特色，我們一開始便決定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問題、而非人物之上。這也可以避免外界的疑慮，認為我們的計畫是為了宣揚某人或某派的觀點。此一研究計畫名為「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而非「當代新儒學主題研究計畫」，也是基於這點考慮。

然而，當我們向院方提出了這項計畫構想時，在學術諮詢總會還是受到了何炳棣院士的強烈反對。他認為：我們提出「當代儒學主題計畫」，無非是個幌子，目的是要建立教派。設所諮詢委員會召集人丁邦新先生與諮詢委員余英時先生都強力為我們辯護。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決議讓我們先執行一年計畫，一年之後再視成果決定是否繼續執行。由於計畫順利執行，反對的聲音便逐漸消失，此項計畫得以繼續執行。不久戴先生因忙於所務，特別是新大樓的籌建，乃推辭計畫主持人的工作，改由劉述先先生與我共同主持。

方針既定，我們便開始進行實際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分兩個階段進行：首先，我們先後舉辦三場小型研討會，分批邀請臺、港兩地的學者發表論文。接著，我們於計畫執行的最後一年舉辦一場「儒學與現代世界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包括中國大陸）二十餘位學者發表論文，並且分別針對「學科對話中的儒學」、

「儒學與宗教之對話」、「儒學與現代世界」三項主題舉辦了三場座談會。在前兩次小型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編輯成《當代儒學論集：傳統與創新》一書，在第三次小型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編輯成《當代儒學論集：挑戰與回應》一書，在國際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則編輯成《儒家思想與現代世界》及《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二書。

第一期計畫完成之後，外界的一般反應還不錯。於是，我們便繼續推動第二期的計畫，而以「儒家思想在近代東亞的發展及其現代意義」為主題，執行期間自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一九九九年七月。這項主題的重點是「東亞儒學」的概念，這個概念是由黃俊傑先生提出來的。鑒於過去中、日、韓等國的儒學研究絕大多數均屬於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所批判的「國家歸屬主義」，帶有強烈的自我中心色彩，黃先生乃提出此一概念，以求突破過去研究視域之局限。過去中文學術界的儒學研究始終將視野局限於中國本土，忽略了東亞其他曾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地區，隱然帶有一種「中國中心論」。這種觀點顯然有一個盲點，即是太過強調儒家思想的共通性，而忽略了儒家傳統在這些地區所呈現的不同面貌。因此，我們不但有必要將東亞視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有必要就這些地區的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來探討儒家思想在其中所呈現的殊異性。自此以後，「東亞儒學」成為臺灣學界的熱門議題，甚至影響到大陸的儒學研究。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的計畫具有開創性與前瞻性。

在執行第二期的計畫時，我們還是按照第一期的模式，陸續舉辦五次小型研討會及一次大型的國際研討會。在第一次小型研討會，我們邀請各地學者提出論文，分別介紹現代儒家思想在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狀況及發展，為這個研究計畫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視野。另外三次小型研討會則按地區分別討論現代儒家思想在日本、中國大陸／臺灣、韓國／東南亞的狀況及發展，以突顯儒家傳統的區域特色。在這四次小型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分別編成四本論文集：《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論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陸與臺灣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還有一次小型研討會則是由本所與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合辦，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在萊比錫大學舉行。其成果由該所的所長莫里茲 (Ralf Moritz) 教授與我共同編輯成德文論文集《儒家思想：起源、發展、前景》(*Der Konfuzianismus. Ursprünge - Entwicklungen - Perspektiven*)，次年由萊比錫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當代儒學主

題計畫」進入國際合作模式的重要一步。

在計畫執行的最後階段，我們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本院舉辦了「儒學思想在現代東亞國際研討會」，邀請各方學者就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地（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地）的現代發展，或者就現代儒學在整個東亞地區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加以探討，並且針對「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的主題舉辦一場座談會。會議論文與座談會記錄後來編成《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地域與發展》及《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問題與展望》兩本論文集。這兩本論文集連同上述的四本中文論文集，可說是當年關於東亞儒學最全面的研究成果。

開完了「儒學思想在現代東亞國際研討會」之後，「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便進入了以「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之互動與比較」為主題的第三期計畫，執行期間為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二〇〇三年元月。牟宗三先生曾有「儒學三期發展」之說，以先秦、兩漢儒學為第一期，宋、元、明、清儒學為第二期，當代儒學為第三期。他認為：第三期儒學是回應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文化的撞擊與挑戰而形成。「當代新儒學」之興起可以說是這種回應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本來就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重要課題。相對於第二期計畫著重探討儒家傳統在東亞各地的特殊發展，第三期計畫則是從普遍的視域來省察儒家傳統，因而涉及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與評價的問題。

第三期計畫的執行也採取與前兩期類似的模式。我們先後分別就哲學、史學與宗教三方面各舉辦一場小型研討會，討論「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的互動與比較」，最後再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在這四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編成四本論文集：《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哲學篇》、《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歷史篇》、《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宗教篇》與《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會通與轉化》。在國際研討會中有七篇論文原先是以英文發表的，以這七篇英文論文為主體，再加上 Leonard Swidler（美國 Temple 大學教授）、John Berthrong 及 Robert Cummings Neville（同為美國 Boston 大學教授）另外撰寫的三篇論文，由劉述先、Leonard Swidler 與 John Berthrong 共同編成 *Confucianism in Dialogue Today: West,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一書，於二〇〇四年由美國 Philadelphia 的 Ecumenical Press 出版。

第四期的計畫以「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為主題，執行期間為二〇〇三年二月至二〇〇六年元月。這一期的計畫與第三期的計畫都涉及「詮釋」的問題，但前者著重於跨文化的詮釋，後者則特別涉及「經典詮釋」。

的提出也與黃俊傑先生的提倡有關。西方過去由《聖經》的解釋而產生詮釋學(hermeneutics)，後來發展為「哲學詮釋學」，是現代西方哲學的顯學之一。我們因而想到：中國過去有儒、釋、道三教的經典，也有詮釋這些經典的大量著作，其中難道不包含一些思想資源，足以突顯中國（或東亞）經典詮釋的特色？現代西方的哲學詮釋學質疑「作者原意說」，強調詮釋的歷史性與脈絡性，這有助於我們抉發儒家經典的多層意義與豐富內涵。這其中也隱含一種「文化多元論」的觀點。就此而言，這一期計畫與第二期關於「東亞儒學」的計畫可以相互呼應。

如同前三期計畫一樣，第四期計畫也採取三場小型研討會搭配一場國際研討會的模式進行。計畫分別從理論、個案、展望三方面進行。在理論方面，我們探討西方現代詮釋學的發展及其問題。接著，我們就儒學詮釋的個案進行方法論的探討與反省。最後，我們在以上的兩項基礎上，對未來的儒學詮釋加以展望與評估。針對「理論」、「個案」與「展望」這三個面向，我們先後舉辦三場小型研討會，最後又舉辦一場綜合性的國際研討會。在這四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分別編成五本論文集：《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理論篇》、《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個案篇》、《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展望篇》、《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比較觀點》與《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中國觀點》。

第五期的計畫不再局限於儒家傳統，而將研究對象擴大為「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執行期間為二〇〇六年二月至二〇〇九年元月。由於劉述先先生已屆齡退休，故改由我和林維杰共同主持。計畫重點有三，分別為：1.「宗教」(religion)概念的涵義及其演變，以及比較宗教之方法論問題；2. 東亞內部各宗教傳統（佛教、道教、儒家、神道教及民間宗教）之比較研究；3. 東亞與西方宗教傳統（耶教、伊斯蘭教等）之比較研究。針對這三項重點，我們分別舉辦了三場研討會，最後再以一場國際研討會總結其成果。在這四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分別編成五本論文集：《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多元對話篇》、《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體用修證篇》、《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當代新儒學與京都學派》、《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理論反思篇》與《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個案探討篇》。

第六期的計畫又回到當代儒學，但重點有所轉移，以「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為主題，執行期間為二〇〇九年二月至二〇一二年元月。具體地說，它包含三項重點，分別為：1. 儒學工夫論；2. 修養論與主體問題；3. 工夫論與政治哲學。這

三個題目都是過去研究當代儒學的人較少注意的。同時，為了推動學術傳承，我雖然掛名為計畫主持人，但實際的執行工作由三位共同主持人林維杰、何乏筆與黃冠閔分年負責。我們也為此舉辦了三場小型研討會及一場國際研討會。但是我們擴大了國際研討會的主題，成為「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其中有四個場次討論日本京都學派，成為這場研討會的特色。在這四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分別編成四本論文集：《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工夫論與內在超越性》、《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政治哲學》、《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與京都學派哲學的對話》及《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工夫、方法與政治》。

第六期計畫結束後，「當代儒學研究室」完成了其階段性任務，擴大為「比較哲學研究室」。由比較哲學研究室規劃的第一個主題研究計畫是「近代東亞與西方思想交流中的跨文化現象」，執行期間為二〇一二年二月至二〇一五年元月，由陳璋芬擔任主持人，林維杰與我擔任共同主持人。計畫包含三個子題：1. 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概念轉換問題；2. 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西學東傳問題；3. 近代東亞思想與西方文化之互動與比較。

我們為這個計畫舉辦了四場小型研討會及一場國際研討會，比過去的計畫多出一場小型研討會。這場額外的小型研討會是本所與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及西學東漸文獻館合辦的，於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在該校舉行。該校的西學東漸文獻館所推動的研究，與我們的主題研究計畫之第二項子題直接相關，故這場小型研討會的主題便是「西學東漸與跨文化研究」。二〇一四年三月我們與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再度合辦「近代中西思想交流中的西學東傳問題」小型研討會，但這回是在本所舉辦。二〇一五年元月我們在本院舉辦「東亞與西方交流中的跨文化現象」國際研討會，結束了這項研究計畫。在研究成果方面，四場小型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已編成三本論文集：《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跨文化現象》、《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西學東漸》及《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傳播者》。至於在國際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正在編輯中，即將出版。

比較哲學研究室推動的下一個主題研究計畫是「近代啟蒙脈絡中的思想論爭」，執行期間為二〇一五年二月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由楊貞德擔任計畫主持人，林維杰與黃冠閔為共同主持人。迄今為止，在東西學術界有關啟蒙的研究固然已汗牛充棟，但我們的計畫特別聚焦於近代東西思想中與啟蒙相關的爭議，涵蓋三個面向：1. 信仰與價值；2. 實踐與倫理；3. 思想與方法。我們針對這項主題舉辦了

兩場研討會及一場國際研討會，並且藉讀書會與討論會深化研究。在這三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將編成三本論文集，請讀者拭目以待。

自二〇一八年元月起，比較哲學研究室與中國哲學研究室共同推動另一個三年期的主題研究計畫，主題是「文化詮釋的哲學基礎」，由黃冠閔與林月惠共同擔任主持人。它涉及以下的子題：1. 文化概念的釐清；2. 文化的區域性或全球性；3. 文化與傳統；4. 文化的描述性或目的性；5. 文化哲學的模型。迄今該項計畫已舉辦了兩場小型研討會。由於計畫尚在執行中，目前就不多介紹了。

除了以上介紹的九個主題研究計畫之外，當代儒學研究室也完成幾項重要的資料編輯工作。首先是《李春生著作集》之編輯。李春生是清末及日據時代臺灣的富商與思想家。一九九二年由於黃俊傑先生的引介，我們認識了李春生的曾孫李超然先生，開始推動李春生研究。經由李超然先生的協助，我們獲得了李春生的大部分著作，開始編輯《李春生著作集》。後來由香港來臺灣做博士後研究的黎漢基加入工作，前後花了十年的功夫，我們終於在二〇〇四年完成《李春生著作集》五冊的編輯工作，由臺北南天書局出版。

其次是《牟宗三先生全集》的編輯工作。牟宗三先生於一九九五年逝世之後，門人弟子商議編輯《全集》。次年，《全集》編輯委員會成立，由戴璉璋先生擔任召集人，而我擔任聯絡人。一九九七年二月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通過了《牟宗三先生全集》的編輯計畫。三月一日我們在本所舉行第一次編輯會議，開始進行資料蒐集與編輯工作。此後，當代儒學研究室成為《全集》的編輯部與資料中心。後來林月惠與黎漢基也加入編輯工作。《牟宗三先生全集》三十三冊於二〇〇三年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最後是《徐復觀雜文補編》與《徐復觀家書集》之編輯。徐復觀先生曾在港、臺各報刊發表了大量的時論與雜文。其中部分文章在其生前已結集成書，但由於當時的政治或人事上的忌諱多有刪節。《徐復觀雜文補編》均復其舊，並加上未刊的文章，約兩百萬字，經黎漢基編成六大冊，於二〇〇一年由本所出版。一九九三年臺灣學生書局曾出版了徐先生門人曹永洋先生編輯的《徐復觀家書精選》。但曹先生手頭還有一批徐先生家書的抄稿，交由黎漢基編輯成《徐復觀家書集》一冊，共二十七萬字，於二〇〇一年由本所出版。以上各書的編輯均屬第一手的基本文獻，對當代儒學與臺灣早期思想之研究均有無法取代的價值。

我在本所工作已二十八年，即將屆齡退休，本所也成立了三十年。回憶過去二

十八年在本所的工作，恍如隔世。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學術也需要傳承，希望後來者能接過棒子，繼續前進。